



## 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

历史学者熊德基对五代十国历史有个精辟的概括：“表面上乱，实际是变。”

在文化领域，最显著的变化之一，便是文学创作在题材上变得更丰富。关于这一点，其实在五代十国时期之前，早已埋下注脚。

以诗为例，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陈尚君此前在相关研究中指出，唐诗从杜甫开始的转变，经过大历、贞元间的逐渐转型，出现了新的高潮，与开天诗风已经大异其趣。“就实质来说，此时的诗人更为世俗化，更为日常化，更善于将诗歌作为记录生活、书写情绪、表达感受的工具，人际交流的作品大幅度增加，诗歌的篇幅越来越弘大，诗题越来越绵长，自注越来越详尽。同时，诗歌所写的内容也越来越不受限制，凡是日常所有的一切皆可入诗，完全改变了传统诗歌含蓄精致的传统。”

从中唐到晚唐，直至五代十国，诗歌创作的变化，也影响了词的创新。陈尚君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五代十国时期文化领域的一大特征，便是“文化下移”，原本由精英垄断的文化发生急剧变化。“词原本是‘俗曲’。在五代十国时期，本是歌舞酒宴上演奏的‘俗曲’，变成了文学主流。这是‘文化下移’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词这一文学创作形式，虽然在后世被认为是在宋代大放异彩，但奠基实则是在五代时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具体来看，词随燕乐而起，经历了早期民间词的原始状态以及早期文人词的稚嫩阶段之后，在五代花间词

陈尚君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五代十国时期文化领域的一大特征，便是「文化下移」，原本由精英垄断的文化发生急剧变化。「词原本是「俗曲」。在五代十国时期，本是歌舞酒宴上演奏的「俗曲」，变成了文学主流。这是「文化下移」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人手中臻于成熟，奠定了艳科基调。作为中国最早的文人词总集，《花间集》为当时供歌伎伶人演唱的曲子词选本，收录了晚唐到五代时期词人温庭筠、皇甫松、韦庄、毛文锡、欧阳炯等 18 人的词作共 500 首。《花间集》又分为 10 卷，每卷 50 首，其内容多描绘女性生活和男女情爱，被称为艳情之作。

《花间集》之外，以冯延巳和南唐二主为代表的南唐词人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身世之感打入艳情，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以词言情，从而使得一直被视为“艳科”与“俗曲”的伶工之词，逐渐发展为可以抒怀身世的士大夫之词。

作为五代最有代表性的词人，李煜凭借“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今昔对比，以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浩渺哀愁，道出一个时代的集体创伤记忆。

身处乱世的士大夫，其词作常流露出深重的孤独感与时光流逝的惆怅。唐末五代词人中，以南唐宰相冯延巳存词最多，兼之上承花间，下启晏欧，又是南唐词创作的先驱，故而在南唐词雅化的过程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冯延巳于《鹊踏枝》中写道：“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这种“闲情”与“新愁”，并非一时之感，可以窥见乱世中知识分子对人生前途渺茫的一种普遍而持久的情绪写照。

韦庄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则在赞美江南风物的背后，隐含了游子对故乡难以归去的无奈与疏离感。亲历唐末乱世的韦庄，自然以笔记录时代的苦难。陈尚君指出，韦庄《秦妇吟》的记载虽非实录，但也不会全出虚构，“天街踏尽公卿骨”